

李志林著

氣論與傳統思維方式

THE THEORY OF VITALITY
AN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WAY OF THINK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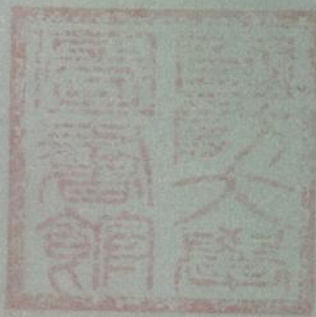
549168



2 019 5096 9

氣論與傳統思維方式

李志林著



學林出版社

责任编辑：乐惟清
封面设计：高山

气论与传统思维方式

李志林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12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十二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 插页 3 字数 285,000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200册

ISBN 7-80510-527-8/B·3

定价 6.70元



作者像(1985年夏摄于庐山虎背岭)

作者介绍

李志林, 1948年生。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硕士、博士, 哲学系副教授。师从冯契教授。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常务),《时代与思潮》论丛编委会常务联系人, 美国国际中国哲学学会通讯会员。

曾三次获得全国和上海科研奖。学术成果主要有:《中西哲学比较面面观》(统稿人)、《价值与评价》(主译)、《中国哲理名言大观》(主编)。并在大陆、港台和美国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60多篇, 其中有20多篇被报刊转载、转摘和介绍。

现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自然观和思维方式、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变革等领域的研究。

序 I

胡道静

我们年轻一代睿思敏求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学者们都在艰苦地工作着，力求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面临十字路口的悠久的祖国传统文化，对于我们民族的当前及未来究竟是个沉重的包袱呢，还是一支仍然能够照亮前途的智慧火炬？对此要进行科学的分析与寻求合理的答案，就必须对祖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沉潜地做系统的、严密的、全面的历史考察，并且和西方文化的核心及其发展的历史作平实的比较，小心地求出结论来。

“核心”是什么？那就是一种笼罩一切的对各种事物的产生都起着作用的“思维方式”。研索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异同及其形成与发展，乃至各自的后果与利弊，主要是哲学史工作者的任务。在这方面，当代哲学大师冯契教授在其名著《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已提出了他的光辉的总体研究方法的结晶。他培养的博士李志林，正是很好地运用了老师的晶体方法来考察中国哲学史上“气论”的逻辑发展，从一个侧面加强和维护了中国哲学史上传统思维方式的发展观，并取得了自己的成就。他无疑是冯先生的一位好学生。

气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项范畴，并是一项主要的、根本的范畴；气论实质上是中国的自然哲学，也就是哲学与自然科学思想交

义的理论。所以，捕捉住这一项哲学范畴来探索其逻辑发展，便是把握住了中国传统文化核心问题探讨的关键，并能进而观察其当前与未来的趋向。

本书根据“察类”、“求故”、“明理”的逻辑进程，全面地考论了自先秦到明、清间中国气论发展的三个阶段，由此阐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二重性和变革的艰巨性，以及向现代化转换的可能性。在具体的分析中，一方面深刻地揭示出传统气论的局限性以及剖析了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思想原因；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了传统气论中智慧的闪光，并从统一场论、现代系统论等寻求中西自然观可能合流和互补的前景，做出了细心而又大胆的预测。

作者评述了当代世界许多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对于中国传统气论重视的观点，加以具体的分析，提出了明确的论据，断然预言：中国传统气论在世界先进科学的进程中可能给予人类智慧燃点炽明的光亮。

我与作者有多年的学术交往，深知其勤奋好学，努力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指导，联系中国哲学史的实际，把握住关键性的问题做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既得到冯契老师的教导，又能善于学习和运用老师的探索方法的晶体，所以取得了带规律性的结论。这使我感到异常的兴奋，特为志林祝贺！

李志林的这部著作曾作为博士论文，得到过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北京图书馆馆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暨博士生导师任继愈先生，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暨博士生导师萧篱父先生，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暨博士生导师石峻先生，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教授暨博士生导师方克立先生，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暨博士生导师方立天先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暨博士生导师朱伯昆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邝柏林先生，上海社

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翟廷璠先生，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暨博士生导师潘富恩先生，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物理史学家袁运开教授等 10 多位著名专家的鉴定。他们从各种角度对此书给予很高的评价。我有幸概括了各位专家学者的评语，写成这一简单的序言。其中若有不周到处和词语不确切处，请评鉴的专家们原谅，并当由我负责。

1990 年 3 月序于上海四平大楼海隅文库

附注：胡道静先生为巴黎国际科学史研究院 (ISHA) 通讯院士、复旦大学文博学院教授暨博士生导师、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副主席、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兼职教授。

序 II

萧蓬父

70年代末、80年代初，莽莽神州经过10年浩劫，由于四凶翦除而得以薰风重染，万象昭苏。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实践权威的恢复，真理标准的讨论，逐步冲破思想僵化的格局，迎来了学术繁荣的春天。

10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挣脱“左”的囚缚和排除右的干扰、并日益与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而得到空前大发展的总形势下，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的研究，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经过拨乱反正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一系列方法论原理的深入探讨，久被奉为圭臬的苏联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及两军对战模式等，终于以其片面性和表面性而被批判扬弃；长期被忽视了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分析方法、哲学认识的矛盾运动及其螺旋发展（“圆圈”）的宏观把握、哲学范畴及其体系的形成和流动衍变的逻辑进程的历史清理等，重新得到了普遍重视和广泛应用。近几年，不仅涌现出一大批通观全过程、揭示规律性的通史教材，而且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以专、深为特点的专人、专书、专题的研究以及断代史、学派史、思潮史、范畴史等的研究论著日益增多。至于席卷全国的文化问题讨论热潮，对哲学史研究也是一大促进，促使人们思考哲学与文化的关系，思考传统文化的哲学灵魂及其所制约的范畴体系和思维方式何以最能反映文化的民

族特点和时代特点，思考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如何察异观同而把握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思考在中西哲学的汇合中如何融会贯通而实现传统哲学精华向现代化的创造性转换。这种种思考，对于深化和活跃哲学史研究，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文化的活跃氛围中，不仅老骥出枥，重上征途；而且更有不少学林新秀，醉心于祖国传统文化及哲学遗产的研究，辛勤耕耘，奋力开拓，在中国文化史、哲学史领域取得了许多可贵的新成果。李志林同志在冯契教授指导下撰成的这本《气论与传统思维方式》专著，乃是80年代中国哲学研究中脱颖而出的优秀成果之一。

气，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最基本、最广泛、涵摄丰厚而衍变繁杂的范畴之一。历代气论，即关于气的学说或理论规定，也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不仅中国古代各派哲学凡涉及本体论、宇宙论者几乎无不各有其气论，而且中国古代的各派宗教、各门科学和各种艺术也都往往涉及哲学上的气论或对气范畴有其特殊的解释和应用。但从哲学史角度考察，历代气论的复杂衍变，不外乎是气范畴的内涵的历史展开和逻辑发展，这一展开和发展的进程，观之以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史观，是有规律可循的。李志林同志的这本专著，旨在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以历史上气论的发展为主线，依据“察类”、“明故”、“求理”的认识逻辑的辩证演进，把先秦以来直到18世纪中国气论的理论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试图揭示这一发展的规律性。这是一项繁难而极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其所以繁难，因为气概念在中国传统的“三才(天、地、人)统一”的宇宙模式中，其原生义和衍生义都极为繁杂。云雾之气，呼吸之气，节候阴阳之气，生理营卫之气，道德意志之正气、浩气，文艺创作之气势、气韵，……等等，统谓之气。如文天祥的名作《正气歌》所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是气所磅礴，凜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诗人

认定,贯通天地人的浩然“正气”是万古常存的。在此诗前的一篇短序中,他还描述了所居污暗囚室中,“当此夏日,诸气萃然”,列举了“水气”、“土气”,以及“毁尸”“腐鼠”的“秽气”等七种“恶气”,包围侵袭,“鲜不为厉”,但由于“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竟然囚居两年未病,“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这是诗人对客体诸气的形态的类解和对道德主体所具有的浩然正气的讴歌。至于历代不同派别的哲学家,则从不同的哲学角度对气的诸多层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抽象,从而形成诸家的气论及其对气范畴的种种理论规定。历史地清理这些认识成果,清理不同气论体系中气范畴内涵的衍变,由表及里,去粗取精,透过历史的现象形态和某些偶然性因素,揭示出历代气论中反映哲学认识不断深化的必经环节和辩证发展的逻辑进程,这显然是十分繁难的科研任务。但通过这样的研究,特别是具体化到通过气论的某一主要内涵(如把气作为物质存在的实体性范畴的传统自然观)进行系统清理,毫无疑问,对于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贡献和局限,更确切地把握传统思维方式的历史特点,是有其重要的意义。

李志林同志在选定这一课题,着手研究时,我曾粗阅过他初拟的论文大纲,已感到其立论运思,既不离矩矱,又多有新意;当时只虑其所选课题跨度大,涉面广,似乎难于在短期内完成。不料弹指两年,在风雨书声中,他已奋力完成了这篇博士论文,实际是一部纵贯全史、引古筹今的学术专著。1989年冬,我应邀主持了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因而得以细读其书稿,纲目井然,乐观其成,尤喜其敬重前修,兼综博采,而又不囿成说,自珍独见,因而能够驰骋古今,扬摧诸家,宏微兼及,经纬成编。今此书由上海的学林出版社出版,我愿略赘数语,向读者推荐此书。

李志林同志这一部以中国气论发展的历史考察为中心内容的学术著作,就其所据史料翔实、运用方法得当、理论概括具有一定深广度而言,可谓是一部力作;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在学术方向

与致思途径上所表露的一些特点。

首先,在论史结合上,坚持了辩证逻辑的理论指导,贯彻了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依据认识史中“类”、“故”、“理”三个逻辑范畴的辩证演进,把中国气论的历史发展大体概括为三个阶段:

(一) 先秦时期——以“察类(对气的形态分类之考察)”为主潮,诸如“阴阳二气”说、“六气五行”说以及“一气”、“精气”说等等均皆属之。

(二) 汉唐时期——以“求故(对气化的动力源泉之探求)”为主潮,诸如围绕“莫为”“或使”之争、“有无(动静)”之辩所展开的各家气化理论皆属之。

(三) 宋至明清——以“明理(对气化的规律性之阐释)”为主潮,凡有关“气化之道”、“理一分殊”、“两一分合”、“动静互涵”以及“至理”、“物理”、“分理”等学说皆属之。

这一气论发展阶段性的新概括,既有史实依据,又以其与思维发展辩证法中的“类”、“故”、“理”逻辑范畴的演进大体同步,而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当然,“类”、“故”、“理”范畴的演进,仅是对思维发展逻辑的一个层面的抽象,不能绝对化为唯一的范畴系列;即使这一个层面的范畴系列,表现在历史大阶段中,也是复杂交错的,不能简单化为固定的模式。但哲学史研究中,在阶级分析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这样的逻辑分析,是完全必要的,否则就谈不上对哲学发展的规律性的探索。本书作者在这方面的探讨,由于坚持了历史与逻辑相一致、思想史与思维规律相吻合的思想原则,因而实现了论和史的深层次的结合,是卓有成效的;其所提供的视角,足资读者去进一步考辨、思索。

其次,在中西比较上,本书自始至终贯注着中西文化、中西哲学、中西传统自然观及思维方式的对照剖判精神;而在比较方法上,对“五四”以来“中西文化异同”之辨中的浮浅认同、笼统辨异以

及取长补短式的静态揉合等方法，有所扬弃和超越，力图跳出中西异路、体用两截的思维模式。书中有选择地限定自然观这一个层面，强调以现代文化意识与现代科学眼光去审视中西传统自然观的差异点，认定中国的气论与西方的原子论都是高度发展了的自然观，抛弃“西方中心论”、“华夏优越论”的陈旧偏见。所谓文化比较，就其可比性而言，只能是同中见异、异中见同、同异交比；而在实际比较中，尤需注意文化发展中的空间差与时间差的经纬关系问题，共性与殊性、常态与变态的矛盾联结问题；还应从人类文化互相交融、涵化的大趋向中去预测未来新的整合前景。作者在书中第五章“从中西比较看气论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的标题下，通过历史的简略回顾，对比中国气论与西方原子论这两种主流思潮，从而概括出了同中求异的七点差异：

1. 整体性与个体性；
2. 连续性与间断性；
3. 无形性与有形性；
4. 功能性与结构性；
5. 化生性与组合性；
6. 辩证性与机械性；
7. 直观性与思辨性。

这样的概括和对比分析，包括对中西自然观这些差异和特点所以形成的原因的分析，都达到一定深度和密度；作为综合集成的认识成果，有特定的理论意义。当然，由于文化比较问题的复杂性，这样一些概括性结论，其精确度和周延性只能是相对的，有的还可以进一步推敲；历史上复杂的文化现象，在主流之外当有支流和逆流；在可概括的一般情况之外，往往出现特例或反例，如在先秦墨学诸家的自然观中，也有与气论迥然相异的有关“端”、“精”、“至小无内”、“非半弗斫”等近乎原子论的学说，印度哲学、医学被引入后，更有“四大”、“极微”等观念的流行。凡此，均有待纳入视野，论

其兴衰绝续之故。当然，这不能求全责备于一部专著。本书关于中西自然观的差异点的概括和分析，其理论意义正在于：可以作为进一步探究的津梁。

第三，在古今贯通上，本书体现了富于历史感的优良学风。荀况有言：“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王充认定：“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作者在本书中力图发扬这种引古筹今的学风，历史地探究古代气论的发展，旨在发掘优秀历史遗产的现代意义，洞察传统文化中的现代化根芽，探索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思想精华与现代化科学思维的历史接合点。本书后半部第四章、第五章及“结语”部分，以足够的篇幅、广阔视野，一方面从气论固有的局限性，深入剖视了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西方的思想原因，其中对传统思维方式的情性积习、含混特点等的揭露，对传统思维方式的缺陷的强固性及其变革的艰巨性的剖析，都较中肯；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了传统气论中的理论智慧。基于对传统气论的逻辑发展中“察类”、“求故”、“明理”三个环节的考辨，引伸出了相应的“整体关联”、“体用不二”、“矛盾和谐”三个思维范式，并从统一场论、生物控制论、现代系统论等的思维定势，预测性地论及中西自然观可能合流的前景。

作者按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要求，清理过去，为的是开拓未来，尊重历史的辩证法，引导人们向前看，从历史遗产的研究中引出具有前瞻性的结论，这是本书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当然，预测性的议论，未必语皆中的，往往在科学洞见中杂有一定的幻想成分。但正如列宁严肃指出的：否认幻想也在最精确的科学中起作用，那是荒谬的。

基于以上认识，我乐于向读者推荐本书，并愿与本书的作者、读者一道，为继承发扬中国优秀文化遗产，促使民族传统智慧向现代化的创造性转化而努力。

1990年3月于武汉珞珈山麓

附注：本序作者为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暨博士生导师。

内 容 提 要

前 言

(一) 气论作为中国传统自然观的突出表征和中国古代哲学的一种重要学说,早已度过了它的鼎盛之年。那么,又何以值得在今天再重新加以研究呢?笔者主要是出于以下四点考虑:(1) 试图对自三四十年代以来就流行的“中国哲学是重人生而轻自然”、“中国传统自然观不发达”的论点加以纠正,认为这难以解释中国古代科学在明代以前为何能领先于世界的事实,究其原因,是对自然观形态作单一化的理解所致。实际的状况是,西方人较早较充分地发展了机械原子论自然观,而中国人则较早较充分地发展了朴素辩证法的气论自然观;气论与原子论是中西自然观的两枝奇葩。(2) 试图对气论发展的规律性作出新的概括,即着重从辩证法的角度,根据“类”、“故”、“理”三个逻辑范畴的辩证演进,把气论的发展归结为三个阶段:先秦——“察类(对气论形态之分类)”,汉至唐宋——“求故(对气化源泉之探求)”,宋至明清——“明理(对气化规律之阐明)”,以便再现气论与中国古代哲学思维辩证发展的同步性。(3) 试图以气论这一个侧面来追寻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4) 试图通过发掘气论的理论智慧及其对思维方式的变革和现代科学的意义,从而引起对传统自然观与现代化、中西自然

观合流等问题的思索。

(二) 中国古代的气是一个颇含歧义的概念。剔除其神学迷信的成分,可以区分出主要的五种涵义:(1)自然常识之气;(2)人生生命之气;(3)精神状态和道德境界之气;(4)客观存在的物质之气;(5)能动的实体之气。本书侧重于第四、第五种涵义,即不仅指客观存在的物质(“Matter”、“Material force”),而且指能动的、充满活力的实体的物质(“Vitality”)。本书所谓的气论,是指中国古代关于气的学说,它比气一元论、元气论涵义要广些;它不是唯物论哲学家的专利,还包括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有关思想。

第一章 先秦时期对气论形态(类)之考察

(一) 笔者不同意将先秦气论概括为单一的“精气”说,而认为它有一个多种形态的并存、递进、嬗变的发展过程,即“阴阳二气对待”说——“六气五行”说——“精气”说——“阴阳二气离合”说。

(二) 先秦气论集中于对“类”范畴,即对气的同异关系的考察。“阴阳二气对待”说和“六气五行”说虽然注意到“气分阴阳”、“阴阳对待”这一点,但还未认识到其同异的辩证关系。《管子》的“精气”说强调了气(精气)之同,以唯物论见长,却忽视了气有阴阳之异及其矛盾关系,因而缺少辩证法。“阴阳二气离合”说虽有唯物主义(如荀子、《内经》)和唯心主义(如《老子》、庄子、《易传》)之分,但它把握了阴阳的矛盾运动,故是先秦气论较为完备的形态。它已包含有汉至明清之际朴素辩证法的气论的胚胎和萌芽。

第二章 汉唐宋时期对气化源泉(故)之探求

(一) 这一时期的气论,集中于对“故”范畴,即对气化源泉的

探讨，并且是与哲学上的“或使、莫为”之争、“体用(本末)”之辩、“有无(动静)”之辩联系在一起的，故很难用“元气自然论”来概括。

(二) 首先是气论与汉代宇宙论上的“或使、莫为”之争的结合。先看三种“外因(‘或使’)”说。董仲舒的目的论的“或使”说，实质上是以目的因(“天”)作为动力因(“或使”)，导致神学唯心主义，但却将气论纳入自己的体系。《易纬》将形式因(理、象、数)与动力因(“或使”)结合起来，导致了先验论；却又用象数论气变，用气变论述宇宙的演化。《淮南子》虽持机械论的“或使”说，但又将气论(“同气相动”)与动力因(“或使”)结合起来。再看四种“内因(‘莫为’)”说。扬雄虽以形式因(玄、象数关系)作为第一因，但又认为，玄包含着元气，玄“摛措阴阳而发气”。王充明确主张“气自然”、“气自为”、“气自变”，以质料因(气)作为动力因(“莫为”)。张衡进一步用气来解释宇宙演化的三个阶段(“道之根”、“道之干”、“道之实”)，这也是质料因的“莫为”说。王符还将“元气自化”作为“道之使”，从而以气论来折衷“或使”说和“莫为”说。汉代气论的主流是非目的论，明确了物质的气自己运动的思想。

(三) 其次是气论与晋唐时期本体论上的“体用”之辩、“有无(动静)”之辩的结合。王弼、郭象等人提出“体用不二”、“物质实体的气以自身为原因”等原理，发展了王充的“气自变”思想。同时，哲学家们(如郭象、柳宗元等)又逐步认识到实体的气是有矛盾的。

(四) 再次是气论与北宋以后宇宙本体论上的“实体矛盾”说的结合。与此同时，气论也取得了“元气实体矛盾”说的新形态(而不能单纯地归结为元气本体论)。王安石以此解释气化的动力，以物质实体的气本身的矛盾(“耦中有耦”)，来揭示气化的源泉。在此基础上，张载以“一物两体”的对立统一原理，深刻阐明了气化的源泉，对魏晋以来的“有无(动静)”之辩作了总结。

第三章 宋明清时期对气化规律(理)之阐明

可以将它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理气”之辩和对气化规律探索的开始。北宋张载提出了“气化即道”的思想,认为理是气化之理,气化具有“顺而不妄”的规律,并对气化的一般规律作了初步探讨。沈括着重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对普遍之理与特殊之理加以揭示。他虽然未对气化之理细作论证,但表示了对“理”范畴的重视。

(二)二程、朱熹提出了唯心主义的理气观和“理一分殊”说。二程首先对“理一(本体之理)”与“分殊(气化之理)”加以区分。他以为,气化“分殊”之理是本体的“理一”的体现,这虽然是对理气关系的颠倒,却包含有对气化“分殊”之理的重视。朱熹通过本体论与宇宙论的结合,使其“理一分殊”说具有明显的两重性,即比前人更多地考察了“理”的“分殊”这一面,在唯心主义形式下触及到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统一,体现了一种有机关联的思维方式,并对气化“分殊”之理作了较细致的讨论,但最终导致了形而上学。

(三)用“理是过程”说取代了“理一分殊”说。明代王阳明开其绪,但他是以心一元论为前提。罗钦顺则在气论基础上讲“理是一个过程”,促使“理一分殊”说朝着唯物论转向。王廷相以“气一则理一,气万则理万”的观点批判“理一分殊”说,并着重强调“理万”。宋应星以科学的考察,使“理是一个过程”的思想更加具体化。明清之际黄宗羲以“即心即气”的泛神论,修正和发展了王阳明的思想,以气化之理是从“已往”到“方来”的过程的观点,冲破了“理一分殊”说的凝固性。

(四)对“理气”之辩和气化之理的批判总结。明清之际方以智从“质测”、“通几”之学出发,反对“执一废万”和“执别迷总”两种